

2008

科举学论丛

第二辑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上海嘉定博物馆 编



线装书局

2008

科举学论丛

第二辑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上海嘉定博物馆 编

线装书局

2008 科举学论丛 第二辑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伟国 李瑞阳 陈燮君 武克全 潘世伟

学术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日根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王炳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邓洪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李世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朱瑞熙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杨学为 (教育部考试中心)
张希清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张亚群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何忠礼 (浙江大学历史系)
祝尚书 (四川大学中文系)
陶继明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商志疆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龚延明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章培恒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黄霖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傅璇琮 (中华书局)
葛剑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举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燕小明
副 主 任: 王 漪 齐春明
委 员: 包仕武 王其良 邵 辉
主 编: 王 漪
执行主编: 齐春明
副 主 编: 包仕武 邵 辉 徐征伟
成 员: 徐征伟 林介宇 慕 颖
金 蓉 马剑颖
执行编辑: 徐征伟 林介宇

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南大街183号

邮编: 201800 电话: 021-59920087

E-mail: kejuxuelc@yahoo.com.cn

科學

丁亥王明





嘉定孔庙泮池



目 录

访 谈

宁静以致远 澹泊以明志

——何忠礼教授访谈录····· (02)

论 文

唐代文士觅举与文学创作三论····· 吴在庆 (06)

略论中晚唐科举及第举人入幕与维护中央统治····· 金滢坤 (14)

八股文破题佳话与蒙学语文教育····· 李子广 (18)

文学作品中的明代基层科举考试

——以《醒世姻缘传》为中心的考察····· 张学亮 (24)

《西厢》制艺版本辨····· 王 颖 (30)

东亚文化圈中的越南武学与武举····· 周兴涛 (36)

江西贡院史探····· 姜传松 (46)

袁中道的科举观····· 黄 瑛 (52)

唐宋时期福建书院研究····· 方彦寿 (58)

冯敏昌与岭南书院教育····· 杨年丰 (65)

从《莺莺传》看唐代科举文化下的婚姻选择····· 朱炳宇 (70)

中国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 时 刚 华 强 (74)

文 物

嘉定县儒学乡贡题名记····· 江汉洪 (78)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馆藏科举人物书画选登····· (84)

“中国科举文化展”巡礼

“中国科举文化展”在东莞巡展····· (90)



嘉定孔庙极星门



2008
科举学论丛

宁静以致远 澹泊以明志

——何忠礼教授访谈录

何忠礼 《科举学论丛》

何忠礼，男，浙江绍兴人，1938年月11月生。1962年7月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时值国家困难时期，即被分往中学任教。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跟随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徐规两教授学习和研究宋史，期间完成了《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的学位论文，开始了对以宋代科举制度史为主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研究。1981年10月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此后一直在杭州大学（后合并为浙江大学）历史系从事宋代史、中国科举制度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1983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科举制起源辨析》一文起，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等刊物上发表有关科举制度的论文二十余篇，其他论文八十余篇。专著有《宋史选举志补正》、《南宋史稿》（政治军事部分）、《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科举与宋代社会》、《宋代政治史》、《南宋政治史》等。此外，还点校、翻译著作多部。部分论著曾获省、市、校各种奖励。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7月退休后，应杭州市社会科学院聘请为研究员，担任该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的南宋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目前主要从事《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和《南宋科举制度史》的撰写工作。曾经担任浙江省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带头人。多次出访日本，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广岛大学非常勤讲师（为博士、硕士研究生讲授一门中国宋代科举制度史），还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库、冈山大学等学校讲学。

《科举学论丛》：您是大陆“文革”后最早研究科举史的学者之一。您在跟徐规先生读硕士的时候，以《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为硕士论文选题，并与徐先生共同发表了《北宋的科举改革与封弥制》（发在《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徐先生为第一作者）。您最初选择科举史研究作为您学术研究的开始，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徐规先生对您的科举史研究给予了什么样的指导？

何忠礼：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当年十月，我考取了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有幸成为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徐规教授的学生（一年后，乐素先生虽然奉调到广州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出任所长，但我后来还是到暨大听完他所开设的课程）。乐素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已开始招收宋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徐师就是他当年的学生之一，因此，陈、徐两师对研究生的培养经验非常丰富，培养方法也几乎一样。他们的培养方法集中到一点，就是非常强调对研究生基本功的训练，希望研究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为此，他们要求大家刻苦攻读宋史典籍，认真做好卡片，不鼓励学生急于成就地去写论文。

两位先生规定我们研究生的课外作业是用一年时间，读完有“宋史资料宝库”之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该书为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所撰，现存520卷，约600万字。这部古籍当时在全国还很罕见，杭州大学总算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作为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张荫麟教授遗留下来的一部线装书，是浙江书本，共120册，真是十分珍贵。于是我们五个研究生

开始接力棒式地逐册阅读，可谓夜以继日。通过《长编》的阅读，开阔了我对认识宋代历史的眼界，接触到了做本科生时从未读到过的宋史资料，尤其对有关宋代科举制度的记载发生了浓厚兴趣。因为解放以来，人们一直对科举制度口诛笔伐，说得它一无是处，可是这与《长编》的记载竟然大相径庭。于是我在分门别类地做卡片时，将重点放到了科举史料上，在近五千张卡片中，大约有三千张是这方面的内容。在读《长编》时，也引发了我对其他宋代典籍的兴趣，先后有选择地读了《宋史》、《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和宋人的一些文集、笔记，这些对研究科举制度史都不无帮助。

一年以后，我对宋代科举制度的基本面貌可以说已经了然于胸，与之相联系的史料也掌握了不少，接下来就开始考虑如何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事。我觉得北宋通过对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形成了与唐、五代科举所不同的许多特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与明清科举有很大不同，值得关注，而前人却较少研究。加之文革期间亲眼看到上大学实行推荐制所造成的弊端，觉得有必要为科举制度正名，有必要将科举制度下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作出区别，于是我决定以《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并获得徐师的首肯。大约用了一年多点的时间，我撰成了七万余字的毕业论文，呈交徐师评点。经过徐师的悉心指导，我再作修改、精炼，终于完成了四万五千字的论文，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当时我们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云南大学德高望重的李埏教授，他在会上给我的论文以很高的评价，并希望我将宋代科举制度史的研究做深做大，这对我今后继续从事科举制度史的研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我运用自己部分研究成果，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与徐师共同发表的《北宋的科举改革与封弥制》一文，实际上就是我毕业论文中有关封弥制内容的润色和加工而成，当然徐师的点拨和教导也起了很大作用。

《科举学论丛》：科举制度的起源问题，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1983年，您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该文被收入您在

2006年出版的论文集《科举与宋代社会》。据说此文曾引起中外史学界的较大反响，能否谈谈当时的有关情况。在您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又有一些学者对科举制度的起源问题做了考证，您是否仍然坚持自己25年前的观点？学界对科举制度起源问题的意见不一，造成对科举制度有关概念界定的不一致，这对科举史研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何忠礼：我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宋代，也十分关注前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和对元明清三代乃至今天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阅读基本典籍，也经常涉猎近人对科举制度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于是，什么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究竟形成于何时？势必成为我首先要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从读中学到读大学，我所接受都是“科举制度就是分科取士的制度”、“隋炀帝创立进士科”，“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这些观点。可是当我在研究生期间接触到大量的史料以后，我对这种观点发生了怀疑，进而作了认真的论证，认为传统的看法并不正确，为此在研究生三年级时，毕业论文刚刚杀青，就转入到对该问题的研究，并于1983年《历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我对上述问题的看法。论文的基本观点认为，科举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度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

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

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

因此，科举制度“是一种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以试艺优劣为决定及第与否的主要标准，以进士科为主要科目的选官制度。”文章通过论证，认为三个特点都出现于李唐，因而科举制度虽然萌芽于南北朝后期，但正式形成于唐代。

25年前，拙文一经刊登，在史学界曾经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波澜，虽然当时的《文汇报》、《新华月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甚至在前苏联的刊物上都作了摘登，但真正同意我这一观点的学者并不多，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隋炀帝创立进士科”等观点，已传承了一千五百

余年，怎可奢望我的一篇小小论文就能改变大家的看法？但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是严肃的，并非标新立异；是经得起史实检验的，不是以偏盖全。例如，关于隋朝是否已有进士的问题，史籍记载言之凿凿，至少可以举出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温彦博、张损之、杨纂、杜正伦等七名进士，但经过笔者考证，他们的进士身份，除部分属于史籍误载以外，不是唐以前对被察举到朝廷中去的优秀士人的一种雅称（北魏虽无进士科之名，但在《北魏刘贤墓志》，却有“息多兴，进士、都督”的记载，此处之“进士”，即是对被察举到朝廷中去的优秀士人的一种雅称，参见《北魏刘贤墓志》，载《考古》1984年第7期），就是对古今称谓借用而造成的误解。如范仲淹撰《田锡墓志铭》云：“（锡）至桐庐郡，以吴越之邦，入朝廷未久，人阻礼教，邈如也。而公下车，建孔子庙，教人诗书，天子赐《九经》以佐之。自是睦人举孝、秀，登缙绅者比比焉。”（田锡：《咸平集》卷首《田司徒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宋前期，哪里还有举秀才和孝廉之事？文中所谓秀、孝，明显就是对进士和诸科的借用。不过，前者是用今称借用古称，后者是用古称借用今称罢了。近有学者指出：《北史》卷二六《杜铨传》载，铨子有正玄、正藏、正仪、正伦四人，其中正玄、正藏、正伦三人于开皇中举秀才，正仪在大业中举进士，这么能说隋朝没有进士科呢。我的回答是：考之《隋书》和《旧唐书》，虽有正玄、正伦、正藏其名，却皆无正仪其人。又据《旧唐书》卷七〇《杜正伦传》载：正伦“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士擢第。隋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不仅得举时间不同如此，而且对所谓正仪为进士一事，竟不着点墨，因而《北史》所谓“正仪贡充进士”事，恐怕也是一种误传。

科举制度创立于何时，与科举特点息息相关，而学术界对科举制度的定义缺乏一个科学的论断，于是就有考试制度实质上就是科举制度，考试制度出现于西汉，所以科举制度也萌芽于西汉等说法。如是，察举有考试，九品中正制也有考试，科举与这些选举制度又有何种区别？即使就考试这一特点而言，察举制度下的考试与科举下的考试大不也一样，这不仅有严格与否的区别，而且前者无黜落

法，只要合格，人人可被察举，后者有黜落法，即使成绩考得好，也受录取人数的制约，怎能因为出现“考试”两字，就不分选举的性质了呢。至于言“科举就是分科取士的制度”，实属望文生义，不值一驳。

“投牒自进”为庶族地主和一般平民子弟逐步开辟了一条读书做官之路，打破了官僚、贵族和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为统治者扩大了阶级基础，搜罗了人才，也为以官僚政治代替门阀政治逐步扫清了道路，这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中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变，是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所使然，意义重大，所以将它的出现作为科举制度形成的最主要标志并不为过。正确界定科举定义，可以认识时代特征，可以知道为什么科举制度比秦汉以来任何选举制度都要进步的原因，可以了解唐宋人才何以能够辈出，也可以了解唐宋文化盛大的原因。反之，如果将科举、与察举、九品中正制因为都所谓“考试”而混为一谈（有些学者主观上并不想混为一谈，客观上却是这样），那么就会模糊科举制度的时代特征，失去研究科举制度的作用。

《科举学论丛》：在科举史研究过程中，您的收获是什么？

何忠礼：主要使我懂得以下五点：一是自古以来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选举制度，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以利弊得失相衡量，科举制度当是最好的选举制度。在今天，我们当然不会以诗赋、经义取士，更不会提倡考八股文，但科举制度那种不讲门第，只问成绩的录取原则，极为严密的考试制度，非常值得后人继承，珍惜这份难得的历史遗产。

二是使我认识到选举成败与政治清明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好的选举制度，能够选拔出好的人才，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反之，就会加深政治腐败，造成社会动乱；而政治清明，有利于选举的公正；政治腐败，会破坏选举的公正。从上述原则出发，使我掌握了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是否清明的标竿：即只要看考试舞弊是否严重，选拔官员是否公正，是面向人民大众，还是为少数人特权人物所垄断，就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社会的政治是否清明，或是腐败到了何种程度。

三是科举考试看似读书人之事，但对整个家族乃至社会的影响极大，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流动，

当时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今人对高考和考研的关注程度。许多社会现象的出现，与科举考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唐宋以降的历史，千万不要忽视科举制度的存在。

四是科举制度对学术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虽说不无副作用（特别是在明清），但从总体而言，积极作用要大于消极影响

五是考试的舞弊和反舞弊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舞弊现象，有时甚至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公平竞争，为了选拔真才实学之士，为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必须守住这一重要的反腐关口，将反考试舞弊的战争进行到底。对那些知法犯法者，对那些手握特权者的考试腐败，必须严厉惩办，决不姑息，否则后患无穷。清代康、雍朝的做法虽然过分残酷了些，不符合今天的时代精神，但能保证半个多世纪不出现大的科场弊案，其作用也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从长远看，它胜过那些不痛不痒的“处理”。人云：“火猛烈，因玩火而被烧死者极少；水轻柔，因嬉水而遭溺死者甚众。”此话恐怕值得深思。

《科举学论丛》：能否谈谈您近期的科举史研究计划？

何忠礼：我从攻读研究生到现在，已过去了整整30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在重点研究和讲授宋史的基础上，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前12年，主要从事宋代科举制度史的研究，后12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宋代政治史和人物史的研究，近6年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则集中力量从事南宋史的研究。最近，我结合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正在撰写一部南宋科举制度史，估计到明年春夏间可以问世。

《科举学论丛》：2000年，您在《历史研究》上

发表《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对20世纪的中国科举史研究史做了非常认真的梳理和总结。那么，学者们在20世纪对科举史的探索，给21世纪的科举史研究留下哪些可供借鉴和发展的经验？

何忠礼：谈不上有什么“可供借鉴和发展的经验”。众人拾柴火焰高，看到目前研究科举制度史的学者越来越多，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出现了类似以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海峰教授为首的强大科研基地和研究力量，看到有众多普及科举知识、研究科举史的博物馆和刊物，感到非常高兴。

《科举学论丛》：有一些学者认为“科举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您对此种观念抱什么态度？能否谈谈您对近七八年来的国内科举史研究的观察，以及您对科举史研究在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何忠礼：我完全同意“科举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这一看法。今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远无尽，尤其是科举与社会、科举与学术文化这两个大课题，更加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科举学论丛》：目前，有不少年轻学者和在读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对科举史研究很感兴趣，您能否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比如，您认为一位好的科举史学者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学术训练？

何忠礼：科举史这门学问，实际上所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从纵的方面来说，应该全面把握自先秦以来各种选举制度演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从横的方面来说，应该深入了解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阶级关系、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概况。如果只就科举研究科举，我认为成不了科举史的大家。我在做研究生时，徐规先生曾送我两句诸葛亮所说的名言，现转送给大家，以作为这次访谈的结束：“宁静以致远，澹泊以明志。”

唐代文士觅举与文学创作三论

吴在庆

摘要：唐代举子在觅举时要根据当时荐举生徒、乡贡的名额以及所要参加的科目的冷热难易与前程等情况，结合自己的身份以确定努力的方向。在荐举中，各州府以等第推荐，为了能获得赏识奥援，被以较前的名次荐举，举子们除了以自己最好的诗文温卷外，也想方设法竭力地干谒投献。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举子们的感情心态是极为复杂多样的，这些常常表现在他们的诗文中。

关键词：觅举 名额与科目 等第投献 心态与文学

唐代文士们完成了读书习业，投入科举求仕，就面临着种种问题，需要他们考虑选择与竞争，觅求荐举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活动。在这一觅举的生活道路上，他们不仅首先要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考虑到当时推荐的名额以及当时科目的冷热难易与前景等情状，而且要据此而选择应对的路子。在这一道路上他们的心态也是复杂多样的，其情状也多表现在诗文中。此处我们就其中所牵涉到的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生徒乡贡的名额及科目之冷热

唐代举子大致有两种来源，即生徒和乡贡。《新唐书·选举志上》云：“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生徒乃来源于国子监所属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和弘文

馆、广文馆、崇文馆的毕业生；而乡贡则是由州县推荐而出的，“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唐摭言》云：“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①

但无论是生徒或乡贡，并非悉数被荐举参加省试，它有人数的限制。《唐摭言》卷一《贡举釐革并行乡饮酒》条记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同上书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条也有以下的详细记载：“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他州府所举送人数也有严格规定。因此每年选送省试的举子，不管是明经或进士科，在人数上是有所限制的，而且比较中央国子监所辖的学馆和地方道、州府所送的举子人数也可看到，后者是大大少于中央学馆的。由此可知，地方上的文士作为乡贡入京应试的机会，是少于中央国子监的生徒的。地方上的乡贡之士，与国子监生徒相比，其中不少乃贫寒之士，没有什么背景与靠山，缺乏奥援，因此相较于生徒而言，其觅举当更为艰辛。州县的应举文士人数应比生徒更多，他们所经历的科举之路远比生徒要曲折、复杂得多，更具有人间百

^① 《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

象，因此此处所述也主要聚焦于这些文士们。

地方上的文士要被荐举参加省试，必须经过县、州府的层层考试。韩愈的《赠张童子序》即记有这一程序：“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①这样经过两次的考试筛选，所能推选到中央的进士即很有限了。但尽管如此，每年参加中央礼部省试的人数通常也在千人左右，这还是就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数而言的。故王定保说：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以至岁贡不减八九百人。”^②如果再加上人数更多的明经科举人，则应试的人数则更多了。晚唐五代，应试的人数有时更比初唐时多。五代边归谔的《请诸道举精加考试不得滥送奏》说：“臣切见每年贡举人数甚众，动应五举六举，多至二千三千。”^③宴仪的《条陈贡举事例奏》亦谓其时举送多有弊端，滥送者众，“致令至时就试，不下三千。每岁登科，罕逾一百。假使无添而渐放，约须毕世而方周。”^④此处所说的“每岁登科，罕逾一百”，乃是合进士、明经等科而言的，如是进士，则按唐制，每年大致在三十人上下，通常仅是二十余人。参加科试者如此众多，而能登科者人数极有限，则竞争就极为炽烈了。

又，唐时科举尽管有各种科目，如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经、明法、明字，又有天子自诏的制科等等。但通常只有明经、进士以及不时举行的制科。士子们参加的多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其中进士科尤其为人向往热中。《唐摭言·述进士上篇》即谓：“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竟集于进士矣。”这一重进士科的风气，使当时有些文人瞧不起明经科出身的人。晚唐康骈的《剧谈录·元相国谒李贺》记此风气云：“元和中，进士

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相国稔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答，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这一记载虽不免有小说家言，其间有不可尽信者，但所反映的一些士人重进士，轻明经风气却是可信的。当时人们推重进士，谓之“白衣公卿”，又称为“一品白衫”，而且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⑤之说。这即是说登进士科极为不易，但却有可能有较通达显赫的前程。因此进士一科乃是当时文人争夺最激烈的科目，以致有不能登此科而悔恨终生者，如“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⑥

等第荐举与干谒投献

大多数士子们既然奔趋于进士科举求仕之路，而此中因荐举名额的限制，故竞争必然相当激烈。在这种情势下，对大多数士子们而言，要在科场上获胜，除了修好举业外，也常要凭借各种社会关系打通关节，投文干谒，以此获得名公权贵的赏识与奥援。因此，投文干谒乃是大多数士子们在求荐之时一种极为普遍的活动。这一造请关节，激扬名声的活动，之所以会被士子们所不得不如此热中，乃基于当时科场上的风气与情势。唐有通榜的制度，即除礼部侍郎知贡举负责科考事务外，还有名人为通榜贴，向主司推荐人选，而被有力者推荐往往登科的可能较大。如“贞元十八年，权德与主文，陆俭员外通榜贴，韩文公荐十人于俭，其上四人曰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其次六人：张弘、尉迟汾、李绅、张俊余，而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弘、绅、俊余不出五年内，皆捷矣。”^⑦又如“陆忠州榜时，梁补阙肃、王朗中杰佐之。肃荐八人俱捷，余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⑧不

①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② 《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③ 《全唐文》卷八六一。

④ 《全唐文》卷八六二。

⑤ 参《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⑥ 《唐语林》卷四《企羡》。

⑦ 《唐摭言》卷八《通榜》。

⑧ 《唐摭言》卷八《通榜》。

止于此，当时还有两种推荐人选的情况也颇具影响。一种是州府乡县的地方官吏，在乡府试中推荐人选上的作用；另一种则为社会上有影响的势要显贵以及文学名人在造声势、排等第、举荐人上的作用。第二种情况《唐摭言》卷六《公荐》门所记的吴武陵向礼部侍郎崔偃夸耀杜牧的《阿房宫赋》，并力荐杜牧，从而使杜牧登第之事即是大家所熟悉的例子。此外《唐摭言》还记载：“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藉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二公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而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崔偃因吴武陵之荐放杜牧以第五名进士擢第，这是朝中名宦推荐进士人选的例子；而牛僧孺获得韩愈、皇甫湜的激扬名声，以此名声“大振天下”，从而有利于他此后登第，这是文学名人起重要作用的例子。至于州县的列等第荐送，也是事关举子场屋成败的关键，这也自然成了举子所奔趋，使出浑身解数以竞争了。《唐摭言》即有三则相关记载：

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依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①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跃云衢，阶梯兰省，即六月冲霄之渐也。^②

国朝自广明庚子之乱，……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钟传令公……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复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玉。解元三

十万，解副二十万，海送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怠。时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者，岁常不下数辈。^③

从上述记载可知，如举子在州府被列为等第而荐送，则其登第也就较为容易。而如果被首荐（即解元），则除了十拿九稳登科外，有时还能得到更多的资助。如钟传所赠的“桂玉”，第二名的“解副”二十万，而解元则比解副多十万。在上述这种举场风气下，文士们为了登科入仕，也就演出了一幕幕以觅举为目标的人间戏剧。而其中以投文为晋见之资的干谒活动，即是最常见的。既然唐代的科举制主要是一种以文选人的制度，因此文才如何，还是能否被推举，乃至登科的主要依据。因此，文士们的干谒活动，就得以文章作为敲门砖与谒见媒介。这一情势，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即有记述：“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贄。”这表明所投献的除传奇外，通常是当时被举场所注重的诗歌。此外，实际上还有各种体式的文学作品。因此，举子们乃至已经入仕而有所干求的士人的干谒投文活动，实际上也是先进行文学创作，以文学作品进行公关，邀名声，造声势。典籍中多有这类记载，如著名文学家元结，曾回忆他年轻时献文的情况说：“天宝十二年，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侍郎杨公见《文编》，叹曰：‘以上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赖。’”^④又《南部新书》：“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⑤杜牧献文云：“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纸，多自焚之。今谨录一百五十篇，编为一轴，封留献上。握风捕影，铸木镂冰，敢求恩知，但希镌琢。”^⑥上

① 《唐摭言》卷二《解送》。

② 《唐摭言》卷二《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

③ 《唐摭言》卷二《争解元》。

④ 孙望点校本《元次山集》卷十。

⑤ 《南部新书》甲卷。

⑥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六《献诗启》。

述三条资料表明，当时所投献之文既有元结的包括多篇文章的《文编》，也有李复言的小说集《纂异》，还有杜牧的诗歌一百五十篇。在文学形式上至少有三种。而实际上文人们所献之文，其形式则远比上述三种丰富得多。且看中唐古文家李观所述：

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献也，有《安边书》、《汉祖斩白蛇传赋》、《报弟书》、《汾宁庆三州殄军记》、《谒文宣王庙碑文》、《大夫种碑》、《项籍碑》、《请修太学书》、《吊韩弇没胡中文》等作，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为辞，辞造成章。中最逐情者，有《报弟书》一篇。不知侍郎尝览之邪？未尝览之邪？^①

又晚唐皮日休在求举时，亦有投献之作，其《文薮序》记此事说：“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复将贡于有司，登篋丛萃，繁缛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雍，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者，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大乐即亡，至音不嗣，作《补周礼》、《九夏歌》。两汉庸儒，贱我左氏，作《春秋决疑》。其余碑铭赞颂议论书序，皆上剥远非，下刺近失，非空言也。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古风诗，编之文末，……《皮子世录》，著之于后，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为十卷，览者无诮也。”^②李观、皮日休所投献之文，其文体即有书、赞、记、文、碑、赋、铭、书序、颂、论议、歌、诗等等。这些大都为文学作品，且有颇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李观所自称的“最逐情者”的《报弟书》，皮日休的《桃花赋》、《河桥赋》等，可见这一投文干谒之举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士子们的干谒是一种通常的活动，并不分季

节时机。但唐人在举荐考试之前是投文干谒最为繁忙的时节。唐李肇《秦中岁时记》云：“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复献新文求拔解，故曰：‘槐花黄，举子忙。’”《南部新书》卷乙亦记此习俗云：“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上述记载中所提及的“槐花黄，举子忙”语，乃出自晚唐五代时的闽诗人翁承赞。他有《题槐》诗：“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昔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③这首著名的反映科举习俗之作，当然是当时士子们觅举赴试生活的产物。它不仅写出了举子计偕时情状，实际上也概括了举子们在入秋后加紧干谒投文活动的情景。

干谒投献的心态与文学

士子们在投文干谒时，为了能达到尽快被赏识的目的，总要做出好文章，并将最佳之作置于卷首。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谓“后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贱见前辈，各以所业，只投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北梦琐言》卷七记有晚唐陈咏以最佳诗句置于卷首的故事：

“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颍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陈咏之所以将水牛、沙鸟句放于所行卷之文的卷首，即在于这两句诗乃曾为朝贵所称赏，懂得此联在今后的行卷中也会为人们所特别注意，所以尽管他还有不少佳作，还是明智地将这两句诗置于卷端。由此可见，士子们在投文中是颇花费一番心思的，其心态是颇为复杂丰富的。

士子们在投献时，一般总会迎合所献者之所长所好，会多一番心思考虑应以什么作品投献，以此创作出应投献的文学作品。赵璘《因话录》卷四记：“吴兴僧昼，字皎然，工律诗。尝谒韦

① 《全唐文》卷五三三《贴经日上侍郎书》。

② 《全唐文》卷七九六。

③ 《全唐诗》卷七〇三。

苏州，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全不称赏，昼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公吟讽，大加叹咏。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改。’昼大伏其鉴别之精。”韦苏州乃诗人韦应物。纪昀评其诗“七言不如五言，今体不如古体。”^①皎然知韦应物擅古体，即先以自己不擅长的古体投献，没料到反而为别具只眼的韦苏州所不赏。后来方以旧作律诗投献，获得韦应物“大加叹咏”。这件事应是特例，具有韦应物这般见识的人是不多的，倒是皎然初投献时的想法乃世之常情。唐晚季，诗风好奇怪，并影响及一些权贵公卿。咸通时的举子李昌符即揣摩到这种习尚，并应用于投文之中。《北梦琐言》卷十记载：“唐咸通中，前进士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常岁卷轴，怠于装修，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留。（庆按，《唐诗纪事》作怊）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浹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你奴辈怪骂腾沸，尽要掴其面。是年登第。”如果说李昌符为了迎合世好而作出的《婢仆诗》不免粗俗的话，那么牛僧孺用以行卷的奇特诗句却是其所擅长，且又为人所称赏的佳作。王说《唐语林》卷二《文学》引《刘宾客嘉话录》说：“牛丞相奇章公为诗，务奇特之语，至有‘地瘦草丛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牛僧孺行卷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奇特语为人所赏识，即他的特长正好与时风相合。另外，他的这一奇特语，也很能含蓄地描述了自己干谒时的心态神色，可谓语带双关，他的以“求人”句投献，应该说也是他体味举场情态的结果。

朱庆馀献诗张籍的事，又是投文干谒时士子们另一种心态的反应。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六朱庆馀条载：

庆馀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馀新旧篇什，

留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世人以籍重名，皆缮录讽咏，遂登科。庆馀作《闺意》一篇以献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于海内矣。

朱庆馀的《闺意》之作，意在委婉试探张籍能否欣赏自己的诗作，能否推荐自己。委婉含蓄的诗句中，表明了朱庆馀献诗后即怀有几分成功的把握，但又不敢确定，急于知晓对方态度的惴惴不安的心态。张籍的酬诗，亦与朱庆馀诗的手法相同，借越女新妆的比喻，以“一曲菱歌敌万金”，来表明自己对朱庆馀诗的赞赏之情。

文士们的投献之作，有时则取材于当时的热门话题。唐宪宗元和十年，武元衡、裴度力主出兵征讨叛将吴元济，这就召致吴元济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憎恨，并派刺客刺杀武元衡，“又入通化坊击裴度，伤其首，坠沟中，度毡帽厚，得不死；僦人王义自后抱贼大呼，贼断义臂而去。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犹未齐。”^②这一事件朝野震动，文士们也自然有感触，并认识到这事件如果形之于文学，当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兴趣。于是不少士子即以此为创作题材：“裴晋公为盗所刺，隶人王义扞刃死之。公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③与此相类似的事还见于张祜的《孟才人叹序》。据《序》所记，武宗皇帝疾笃时，所宠孟才人“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及帝崩，柩重不可举。议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棕，棕至乃举。嗟夫！才人以诚死，上以诚命，虽古之义激，无以过也。进士高璩登第年宴，传于禁伶。明年秋，贡士文多以为之目。”^④上述事件士子们均能及时捕捉住，将它写成文学作品并用以行卷。这反映了文士们在需要投文的时期，是特别具有观察社会动态，并快速作出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韦苏州集》十卷条。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③ 《唐国史补》卷中。

④ 《全唐诗》卷五五一。